

当代中国乡村复兴之路¹

何 慧 丽

本文将结合多年来乡建界同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谈谈当代中国的乡村复兴的方向、使命及动员机制，谓之以当代中国乡村复兴之路。

一、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指向乡村复兴

新农村建设，其核心是“农村”，其修饰语是“新”，其落脚点在“建设”。但在“新”与“旧”的历史变迁关系中、在“城”与“乡”的现实空间格局限制中，所谓“农村建设”之“新”，能“新”到哪儿去？要“新”到哪儿去？中央所提出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五位一体”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社会历史变迁规律上的“新”，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东西，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抛弃一切旧的“新”事物长时期地存活过。倒是继承一些传统乡村基因、又旨在解决现实严重问题之需求的发展趋势，却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特点。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的本质规定性，取决于其“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其“内因”是根据，它存在于具有千百年持续生命力的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中；而“外因”是条件，除了国家工业化剩余的财力支付于乡村建设之外，还有基于对目前过度城市化现实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危机所促发的、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向往乡村生活和食品安全消费的社会潮流。因此，撇除任何主观意愿，新农村建设并非或形式或本质上的诸种城市化表现（包括各个领域里面的标准化、单一化、市场化、规模化等做法），因为那些不是由农村传统基因和城乡张力问题这二者所规定的本质方向。那些抛弃和违背了乡村传统生命力的做法，不但解决不了城乡张力所产生的问题，反而滋生或加剧了更多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问题），它只具有个别条件下的特殊意义，而不具有一般条件下的普遍意义。

因此，一般条件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农村建设，其道路只能、必须、也应该指向于乡村复兴。所谓乡村复兴，是中国乡村在经历了传统向现代一百多年的中国转型需要之后，相对于历史悠远的传统乡村所形成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取向。**复兴是乡村传统性智慧在现时过度城市化形势下的重新阐发和发明，是对乡村乃至民族生命之根的重新发现、发扬和创造，也是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和而不同”的“合和”之道的自觉践行。**就历史变迁来看，去掉了“根”的乡村建设无所处之源由；就现实空间来看，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则无存在之凭依。

道理是要靠实验或者实践去践行的。多年来，由知识分子参与的乡建行动，在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有机结合中，一方面开展寻找生命之根的行动，除了以知识分子自觉参与的乡村朝话、饭话和夜话等形式，以感觉天地、田野、建筑、人文、生活等方式通达至心灵和理性

¹ 本文曾经改编发表在《人民论坛》2012年31期。

之外，还在基层干部的主导下，通过与农民精英和积极分子相结合的办法，发动组建老年人协会，村庄文艺队等组织，以秧歌、腰鼓、盘鼓、传统太极和地方戏曲等多种弘扬乡土传统文化方式，恢复和重建这种乡村由来已久的公共生活空间，这是传统乡村“复兴”要义之一；另一方要义在于它是在城乡张力之中自觉疏导城市化问题的“合和”行动，其新内涵是动员组织各种人才投入到适合于后工业时代的新型乡村建设试验中去，它是集农民合作经济、乡村休闲旅游业、生态民居工程、城乡互助型有机农业、乡土性教育，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性试验。

二、当代乡村复兴的使命之一：汲取祖先智慧

乡村复兴欲存活于当代，其任务和内容取决于当代精神的需要。对传统农耕社会系统被支解的忧虑不是来自于形而上的“乡恋乡愁”之情感，而是来自于解脱过度城市化危机的现实需要。当代乡村复兴的任务，首先是要汲取祖先智慧。

祖先在一个地方能生活数百年、上千年，在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介入之前，他们靠的是什么？传统农村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遗迹（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那些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手工艺技术、传统农耕技术，难道只意味着过去辉煌的残余吗？而日渐式微的道德自觉自治、实物互换经济、宗法秩序维持、民间纠纷调解，等等，在今日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代理者和公共服务成本愈来愈高昂的情况下，是否有条件得以激活和再生，从而成为国家和政府代理乡村公共服务的补充或者替代形态？以2011年的碧山丰年庆为例。其主体展览《互助·传承》，正是对这些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互助自治、政治经济建筑文化作为一个相辅相成体系的初步呈现成果。此外，《百工》展览厅还将各种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工艺和创作，以及创作它们的民间匠人、艺人和民间艺术家，发掘出来。至于手工艺市集的庙会展现，这是活生生的农村生活用品盛会和社会交往方式。这些承载着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别样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的物或人，虽然有的已经鲜为人知或者正在消逝，但仍然透露着与乡村地理风物资源自治共处的、多样的、本土的特色。

显然，有别于工业文明生产生活的乡土文明样式，在工业文明的上升和鼎盛时期，是那样的老套、落伍和不合时宜；但在工业文明晚期和生态文明初期，传统农业文明样式却在中国遭遇困境的当下，得到了重新解读的生命力。当乡村乃至整个社会面临诸多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祖先的智慧，作为反省我们虽短时期形成却相当固化的工业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从而形成影响今日经济政治模式的可能性。当代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重建需要祖先的智慧做参照。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祖先智慧，“决不像一件旧衣那样可以脱掉和抛弃，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规定着一个民族今后行为的速度和方向”（曹锦清语）。

三、当代乡村复兴的使命之二：从乡村一面探索新型城乡链接的现实路径。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一种社会主流存在的状况下，如何实现城市乡村之间的“兼相爱”、“交相利”？也即相反的双方呈现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

路径一：提高乡村区别于城市的人文、自然景象的自觉性，促成“从城市到乡村”的资源回流并聚集乡村的可能性机制。

以安徽黄山黟县古村落为例。越千年的黟县古村落自有其独特的景致雅韵：峰峦之连绵、河水之盈灵，摄魂夺魄；石街之曲折幽深，民居之粉墙青瓦，藏风聚气，其园林、庭院与题额，其三雕（石、砖、木）、天井和楹联，无不叹为观止；至于古朴的服饰、饮食和民风，以及那种庭院洒扫、田间劳作的怡然自得，更是自然而淳美。黟县岂今已有各类景区景点 12 个，初步成为一个集文化、度假、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地。

至于普通农村，即使没有所述的吸引城市人向往的自然、建筑和生活，也是有着一套别样于城市高节奏、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乡土家园视觉系统、生活系统和建筑系统，对它的修复和重建，有利于留守人群的生活保障，并将最终解决离土人群的后顾之忧。

路径二：发展有机农业，在修复生态环境之同时为市民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

普通的乡村，其产业只能、必须、也应该是农业，用以与城市交换的是农副产品。今日普通乡村出产的农副产品，大都是化学化、石油化农业和增产型农业的产物，它不但最终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农药化肥激素等残留长期作用于土壤、水体、空气、动植物等生物系统，造成了民众消费品不安全的根源，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自身都已经遭受着因食品不安全而产生的身体健康等严重问题。中央早在 2007 年就提出了“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并呼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显然，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互动机制——建立在生产者安全生产、消费者文明消费基础上的农副产品公平贸易机制之形成，将成为未来中长期的一种发展趋势。普通村庄顺势而为，践行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念，发展多样化、中小型化、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有机农业，完善乡土社会的经济系统，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事业。我们多年前就开始探索的“购米包地”、“购猪认养”、城乡互助合作型生态农业的各种做法，就是响应“生态文明”战略转变的有益试验。

此两种路径，可称为城市与乡村“兼相爱”、“交相利”的必经之路。

四、当代中国乡村复兴的动员机制。

城与乡作为空间上两种存在的要素表现，如何缓和他们作为对立面的“剩余、派生或者分化”，从而达到双方的协调与共生，这要求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一方积极主动地将对立面的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责任。多年来，我们在包括河南在内的乡村复兴建设过程中，总结出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动员经验，其中，强调了“政府与社会力量”作为外发力量对农民主体内生力量的激活、促发、带动作用，被称为“外发促内生”的动员机制。

问题在于：当前农业地区县乡政府的主要任务仍内在地具有“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冲动的惯性，其主导乡村复兴的角色虽有但仍很不到位；而社会参与的力量则往往显得理念充足而实际经验和力量不足、功用弱小的状况；农民呢，更是由于组织缺失难以形成有效主体。在这样的境况下，有条件就大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有制度空间就利用，没有制度空间就依靠人的志愿联合体的主动性发挥，尤为重要。

因此可以强调几点：执政党“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体制内空间和开明领导的存在、城乡市场空间的存在等事实，是乡村复兴实践的依据和起点；诸多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之先行探索，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农民组织主体力量的形成，需要借鉴传统宗法制度及传统国学文化的积极因素。

乡村复兴这一事业,将在诸多合力错综发展的必然王国中,奋然前行。顺之者心安事和、国稳民昌,逆之者乡愁加剧、弊象丛生。